

论永基卓玛小说中的“回归”主题

★沈鹏

永基卓玛,一位藏族女作家,新闻工作者出身。2006年开始文学创作,小说集《雪线》是其代表作,也是《香格里拉文学系列丛书》中的一部重要作品。

作为藏族本土作家,永基卓玛热衷于藏族文学的创作。在她的作品中,她不仅从藏族人民的饮食、住宿方面描写藏族人民的独特生活方式,也从藏族人民的精神文化方面入手给读者呈现一个立体、丰富的藏民族文化系统。读永基卓玛的作品,我没有一种对少数民族文化的陌生感,而是觉得,确实是!这样的生活描写才是属于藏族人的生活,这样的文化才是藏族文化。另外,笔者认为,在永基卓玛的创作过程中,无论是小说故事情节安排还是小说内容的呈现,作家一直都在强调一种“回归”意识,从而在作品中构建一个由内向外回环往复的“回归”主题,以达到对藏族“轮回”文化的烘托。

生命意识的“回归”

对于其他民族的人来说,似乎藏民族文化都具有一定的神秘性:藏族人民拥有极为坚定的民族信仰;他们崇尚自然,呵护自然;他们也懂得惜生,将生看得极其平淡。在永基卓玛的创作中,这些独特的藏民族文化特征都纷纷被提及。《扎西的月光》中她提到:藏族人到山里时是不能叫喊的,每个山,每个湖都有自己的精灵,大声的喊叫会吵到山里的神灵。《九眼天珠》中她写到:藏族的每一座山,每一片水,甚至每一棵树,每一朵花,每一棵草都是有灵性

的,都是一种生命,我们都要去尊重他们。这种崇尚自然、尊重自然的民族观念在永基卓玛的作品中比比皆是。同时,她也在自己的作品中写到藏族人的生命意识的回归。《九眼天珠》中她写到的:生命是轮回的,无休止的……生命是一个轮回,有了开始,就永远没有结束。《今夜,远方有雪飘落》中也写到:人生只是一个过程,死亡并不可怕,肉体消失了,精神却是永存的。藏族人民崇尚自然,认为自己生前接受了大自然的众多恩惠,死后也应当回归自然。所以,他们的丧葬习俗是:天葬、火葬和水葬,主张人死后完整的自己应当回归自然,奉献自然。在他们眼中,生死是极其平淡的,人的生死是生命的正常完成过程,死亡是一种新生,也是生命的另一种归宿。作为藏族本土作家,永基卓玛对这种生命意识的回归有着较为深刻的人生体验,故她会将这种生命意识注入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力图在作品中深化藏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涵,让读者更多地了解藏民族文化。

藏族文化的回归

在永基卓玛的作品中,笔者注意到,她的作品中似乎都在隐约地提及现代文明与藏区文明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作为读者,我不妨揣测这是作家的有意为之。首先,作为一个藏族人民,永基卓玛对于藏族本土文化的激流改变是最有感触的,她笔下的故事大概是她日常生活中经历过的、最常见的生活元素。另外,她还是一名新闻工作者,她较常人能够快速地在习以为常的生活中发现不经意间的生活变化。可能正是这两方

面原因的叠加激发了永基卓玛的创作动力。

在她笔下,我们能看到藏区旅游业的发展确实带动了藏区的经济发展,也解决了当地人的部分就业压力。比如:牵马人的出现、当地藏民带着自家的牦牛与游客拍照、在重要景区卖游客旅游需要的东西等。这些产业都是藏区旅游业发展的衍生产物,它们的出现不仅满足了游客的旅游需求,也成为当地人的重要经济来源。但同时,作家也注意到,在旅游业大潮对藏区文化进行大肆宣扬的同时其实也是对藏民族文化的一种解体。在她的作品中,我们随处可以看到悄然出现在藏区的旅游文化产业,比如:文化饮食城、卡拉OK等。可以说,它们的出现对于藏区人民来说是突然的,但是,当他们在这种旅游业大潮中获得更多利益的时候,藏区人民就会放弃自己内心坚守的藏民族文化,从而成为了旅游业大潮中的一分子。在永基卓玛的作品中,她几乎都提及到这点。

《今夜,远方有雪飘落》中,她塑造了一个极具藏民族原生力量,热情奔放的藏族姑娘形象。但是,随着现代文明之风刮进藏区,藏族姑娘放弃了自己喜欢的热巴舞做起了饮食文化产业。《扎西的月光》中,她写到藏区旅游业的出现给藏区人民带来更多的诱惑,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在旅游业大潮中,藏区青年们似乎都没有意识到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就已经奋不顾身地奔向现代文明。《九眼天珠》中永基卓玛主要通过作品表现强调现代文明对藏区新一代年轻人的影响。长期生活在藏区的孩子依

然保持对藏民族文化的喜爱、崇尚之情,而因各种原因长期远离藏区的年轻人,他们身上具有的藏族气息已离他们慢慢远去。

笔者认为:作为作家,永基卓玛可能正是在激流变化的背后清醒地看到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看到藏区青年们对藏民族文化的背离以及藏区日常生活的改变,她才会在自己的作品中反复强调这种冲突。但实际上,在她的作品中,她基本上为处在两种冲突之间的人指明了出路:那就是回归,回归藏区、回归本民族文化。

小说结构的“出走——回归”模式

在永基卓玛的众多作品中,她基本上都刻画了一个身处于藏族文明和现代文明之间的“文化中间物”。他们可能是藏族人,从藏区走向现代文明,在现代文明中找不到自我的归宿便再次回归藏族文明。他们也可能是汉族人,厌倦了喧嚣的城市生活,反而在藏区找到归宿。无论怎么说,她笔下的人物基本都在完成自我人格的塑造与心灵追求的内在“回归”。

《唱歌的月亮》中的扎西离开村子进入城市,再因各种因素回到藏区是一种回归。《今夜,远方有雪飘落》中琼受旅游业大潮的影响出逃于藏族文化,丢弃自己喜欢的神巴舞,之后到再次回到藏族文化的怀抱是一种回归。《雪线》中扎西和琼在现代文明的城市生活中找不到自我,而选择重新寻找更接近自己的自我是一种回归。《无言的绿松石》中,在现代城市文明中长大的女孩卡西放弃城市生活去可可西里做志愿者是也是一种回归。

鲁迅的生活趣味

★董宁

鲁迅给人的印象近乎冷峻,一副凛严的面孔像一张不会动的铁板,目光也总像一把利剑,在那样的乱世中穿行。在这样的模式下读鲁迅的作品,越读越觉得鲁迅是一个硬骨头,张口说出的话,总带着一股寒气。其实,生活中真实的鲁迅并不完全是这样。从下面一个个小故事,我们可以看出,鲁迅是那么有趣,那么可爱。

有一次鲁迅的侄女问他:“你的鼻子为何比我爸爸(周建人)矮一点,扁一点呢?”鲁迅笑了笑说:“我原来的鼻子和你爸爸的鼻子一样高,可是我住的环境比较黑暗,到处碰壁,所以额头、鼻子都碰矮了。”鲁迅年轻时并不是很帅,他对自己却信心有加。一次英国作家萧伯纳见到鲁迅时说:“都说你是中国的高尔基,但我觉得你比高尔基漂亮。”听了这样的溢美之言,鲁迅不但没有谦卑之词,竟然说:“我老了会更漂亮!”

鲁迅来到上海专事写作,一次夜深人静时,外面的猫不停地叫,屡屡打断他写作的思路,鲁迅随即拿起手边五十支装的铁皮香烟罐,将一棵棵香烟对着可恶的猫一一发射。那时鲁迅已年过50,却可爱得像个小孩子。

大家知道,标点符号虽然不起眼,在文章中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当年的出版界对标点符号不重视,在支付稿费时,往往把它从字数中扣除,不给稿费。鲁迅应约为某出版社撰写书稿,他的书稿里通篇没有一个标点符号。编辑看后,以难以断句为由,去信要求鲁迅加上标点符号。鲁迅回复道:“既要作者加标点符号分出段落、章节,可见标点还是必不可少的。既然如此,标点也得算字数。”那家出版社没办法,只好采纳鲁迅的意见,标点符号也折算字数支付稿费了。

鲁迅的胡子很有个性,从日本留学回来那几年,他的胡子是日本式的,两头往上翘,看起来很滑稽,常被周围的人嘲笑,说他是崇洋媚外。鲁迅烦恼得不行,干脆把胡子修剪成隶书的“一”字,怪怪的,很逗人,从此却相安无事。

订报读报成为“家风”

☆魏益君

受老父亲的影响,我们一家老少三代都是报纸迷,每天的报纸来了,一家人争相阅读,其乐融融。

父亲早些年从事新闻宣传报道,家里的报纸堆成了山。这其中有关刊登父亲稿子的报纸,当然多数是父亲收集的拟要投稿的报纸,党报、晚报、商报以及许多五花八门的行业报纸。每天,父亲翻阅着那些报纸,将一篇又一篇的稿子投给各地媒体,醉心于阅读,热衷于写作。

让我们一家真正热衷于订阅报纸的缘于女儿。女儿读小学时,对作文一直排斥,写出的作文往往风马牛不相及,惹出许多笑话。好几次家长会,老师谈及女儿的作文,弄得我好没面子。后来我问父亲,怎么提高女儿的作文水平。父亲说,这有什么难的,订几种作文报,看别人的,写自己的,用不了多长时间作文水平就上去了。

这招还真管用,收到报纸后,引导女儿读了几期,就让她模仿着写出一篇。父亲稍加润色修改,投给报社,居然刊用,还寄来了稿费。这下女儿的热情来了,每回收到报纸,就迫不及待地专

从读者的角度看,笔者觉得永基卓玛似乎很喜欢强调故事中人物的回归。所以,在她的作品中基本上都有这类人物形象的出现。这类人生活在两种文明之间,在经历两种文明后才清醒意识到,现代文明固然美丽,但自己还是需要回归于原生的本土文化中,去坚守自己内心的一份纯净。并且,笔者认为,永基卓玛在自己作品中写到的这种回归,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从现代城市文明转向藏区文明的生活方式的回归,它也是一种生活态度与精神价值取向的回归。这一点从作品《雪线》、《无言的绿松石》皆可以看出。

总的来说,作为藏族本土作家,永基卓玛笔下的藏民族生活描写是深入人心的。她在作品中呈现给读者的并不是刻意的藏民族文化书写,而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自然流露。她关注藏民族文化的变迁与发展,也关注藏民族文化的继承与传递。她不仅是藏民族文化的继承者,也是藏民族文化的守护者。她善于借助自己的作家身份将自己的所见所感注入到文学创作中,她也善于运用巧妙的写作技巧,以一种“由内向外”的写作方式将作品欲要表达的深刻内涵与小说本身的结构形式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对作品中藏民族文化的烘托。正是这样的写作方式才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会对她所描写的藏民族文化产生丝毫陌生感,而是觉得似乎小说情节本该这样发展。但实际上,这只是永基卓玛在作品中呈现藏民族文化的一种方式。笔者认为,这也是永基卓玛文学创作的高明之处。

冬天降大雪,气温骤降,给人们的生活和出行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其实,从历史记载来看,中国古代的大雪远比现在大得多。

汉武帝时期遭遇大雪灾年

元鼎二年三月大雪“平地厚五尺”

学术界一般认为,在中国五千年气象史上,曾出现过四个寒冷期。对于从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850年,即西周前期的第一个寒冷期,相关史料几乎没有。最早的一次记载并未直接说下雪,而是“雨雹”,见于《竹书纪年》,事发西周孝王七年,“冬,大雨雹,牛马死,江、汉俱冻。”

到了第二个寒冷期,大雪的记载逐渐多了起来。

第二个寒冷期从公元初年到公元600年,相当西汉末年到隋初,期间经历东汉、三国、晋、南北朝。实际上,在这之前反常气候已经出现,大旱大涝不断。刘彻(汉武帝)当皇帝时,好几个年头的冬季都出现了极端的大雪天气。

汉武帝当皇帝长达55年,是西汉在位最长的皇帝,天灾人祸也最多。其间有三个大雪灾年,被记入了史书。

据《汉书·五行志》记载,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十二月,这一年刘彻打到了“一角而足有五蹄”怪兽,被视为祥瑞,于是定年号为“元狩”。实际上这一年天下一点也不吉祥,当年冬天,“大雨雪,民多冻死。”大雪到底有多大,从很多老百姓被冻死的情况来分析,这场大雪肯定不是一般的大。

七年后又连着两个雪灾年。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三月和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三月,连着出现极端倒春寒。元鼎二年三月的大雪“平地厚五尺”。元鼎三年的情况比元鼎二年更糟糕。常年一般到阴历三月,中原地区的河水是不会结冰的,这年竟然结了;而到了阴历四月,又下了场大雪,关东十余郡县老百姓缺乏口粮,饥寒交迫,出现了为了活命“人相食”的人间惨剧。

虽然天下饥荒不断,刘彻等西汉皇帝却将国家财政的三分之一财富用来造陵墓,置随葬品。在东汉初年的建武二年(公元26年)一个大雪天,这些帝王陵大多让赤眉军盗了。当时起义军无衣无食,“逢大雪,坑谷皆满,土多冻死”。在这种情况下,起义军“乃复还,发掘诸陵,取其宝货”。

唐昭宗时“自冬至春雨雪不止”

天复元年“民冻饿死者日以千数”

在第二个寒冷期内,各个朝代都出现了反常性的雪天。三国时期的吴国,太平年间竟然出现雷暴雨后下大雪的奇怪气象。据《晋书·五行志》记载,当时吴国是孙亮当皇帝,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公元257年4月)先下了一场雷暴雨,第二天乙卯日下起了大雪,气温骤降,“大寒”,史家称,“既已雷电,则雪不当复降,皆失时之异也。”阳历4月5日下雪,无异于民间忌讳的“六月雪”。

六月雪,向来被中国古人视为不祥,元朝关汉卿杂剧《窦娥冤》中便用“六月下雪,三年不雨”来形容窦娥的冤情;汉乐府《上邪》中则把“夏雨雪”,视为世界末日来临,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六月雪”在中国气象史上还有很多记载,如战国时,陕西一带多次下“六月雪”。

秦躁公八年(公元前435年),“六月雨雪”;周威烈王四年(公元前422年),“四月,晋大雨雪”;周烈王三年(公元前373年),“夏六月,赵(国)雨雪”。

不过,这种反常雪天尚不算可怕,唐末一场超级大雪连皇宫每天都有人冻死了。唐代倒数第二位皇帝李晔(唐昭宗)主政末期的天复元年(公元901年),是个大灾年,先是夏秋之交“久雨”,入冬以后就开始下雪,连雨夹雪一直下到春天也未停止,即史书所谓,“自冬至春雨雪不



止。”

在这种极端天气下,“民冻饿者无数”。在当时的陕西京城,末到十一月便“城中薪食俱尽”,“民冻饿死者日以千数”,每天冻饿死的老百姓都在千人以上!

当时正值荒年,再加上这么糟糕的雪天,连皇宫粮食都断炊了,李晔只好命令宫人,在宫中支起一个小磨,自磨豆麦充饥。“自后宫、诸王十六宅,冻饿而死者日三四”,堂堂帝王之家,每天都有三四个人被冻饿死,民间灾难之深重就可想而知了。

唐朝时的怪雪还有不少,如在李适(唐德宗)当皇帝的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初四(公元805年2月10日,京城下起了“赤雪”,百姓议论纷纷,视为凶兆。

宋哲宗时“苦寒”“死无亲属者官瘞之”

天禧二年永州大雪“六昼夜方止”

公元1000至1200年的两宋时期,是中国三个寒冷期。《宋史·五行志》上的雪灾纪录以北宋初期为最,北宋第二位皇帝,宋太祖赵光义主政的22年,有5个年头发生雪灾——太平兴国七年三月,宣州霜雪害桑稼。雍熙二年冬,南康军大雨雪,江水冰,胜重载。

端拱元年闰五月,鄆州风雪伤麦。淳化三年九月,京兆府大雪害苗稼。淳化四年二月,商州大雪,民多冻死。

宋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正月,永州大雪,“六昼夜方止,江、溪谷皆冻死”。

在赵煦(宋哲宗)当皇帝的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冬天,京师(今天河南开封)所在中原一带,入冬以后天天下雨,至春不止,导致“苦寒,民冻多死”。不少人家整户被冻死,连尸体都无人掩埋,朝廷下诏赈灾,“死无亲属者官瘞之”,官府安排人来掩埋尸体。赵煦因此取消了当年元宵节的游幸活动,并恩告地方,进行抚慰。

另一次发生在赵恒(宋钦宗)当皇帝的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大地再遇罕见大雪严寒,从当年阴历十一月到次年正月,雪下个不停,平地积雪厚达好几尺,“人多冻死”。

当时京师站岗的士兵手冻得兵器都拿不了,有的士兵被冻成了僵尸。除了雪,还有强劲的西北风,《宋史》上记载:“大雪,天寒甚,地冰如镜,行者不能定立。”老百姓没吃的没烧的,官府不得不让老百姓到皇家花园砍伐花木当柴烧。

天灾之后又来人祸。靖康二年四月,金军攻破东京,烧杀抢掠,把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俩以及皇族、后宫妃嫔、贵卿、臣僚等计三千余人,统统俘虏回北方金国,是谓“靖康之难”。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综合卷》将这两次雪

灾,列为北宋年间“严重强寒潮灾害”。是不是最严重的?还真不一定,因为元祐二年雪灾的前一年,即嘉祐元年(公元1086年)正月二十四“大雨雪”,一周后的二月初三又是一场“大雨雪”,导致“泥途尽冰,都民寒饿,死者甚众”。

明武宗时,太湖洞庭湖鄱阳湖“封冻”

清康熙九年大雪连降40天

“民多冻死,鸟兽入室呼食”

从明朝中期起,中国进入了第四个寒冷期,一直到1900年前后的清末才结束,长达500年,明、清两朝恰好处于这一时间段内,所以国内学者把这一时期称为“明清小冰期”,国际上则称为“现代小冰期”。

自然,明清两朝的雪灾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频繁。《中国气象灾害大典·综合卷》中,1900年以前的“严重强寒潮灾害”仅节选17次,明清就占13次。

朱祁钰(明代宗)当皇帝的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冬,中国自北到南大部分地区都下了罕见大雪,极为严寒,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广西等地连下一个多月的雪,灾情严重:江苏苏州,太湖断航,港口封冻,“人畜冻死万计”;浙江安吉,“冻死百余人”;河北沧州,“冻死人畜无数”;山东德州,“人畜冻死”。

朱厚照(明武宗)当皇帝的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雪下得最凶猛的是华东地区,这些地区江河冰封,鸟兽冻死,甚至冻毙村民。南方的太湖、洞庭湖、鄱阳湖等大湖竟然同时成了“超级溜冰场”:太湖,“冰,行人履冰往来者十余日”;洞庭湖,“冰合,人骑可行”。

在明清小冰期,又以清朝遭受的雪灾最严重。《中国气象灾害大典·综合卷》节选明清“严重强寒潮灾害”13次中,有9次发生在清朝。有学者又把17至19世纪的这一段时间称为小冰期中的“寒冷期”。离现在最近的500年中最寒冷的五十年,即出现在这一时期,具体说,是公元1650至1700年间。

这最冷的五十年里,连下一个大雪并非罕见,而是常见。如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的全国雪灾,被冻死者“甚众”。在河北一带,不少人被冻毙在山洞里。而当年南方的湖南永州等地,竟然也连下40多天雪,“民冻死者无算。”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冬天,华北、华东、华中等地连降大雪,连续下40至60天不等,黄河龙门段都冻起来了,淮河更是坚冻两个月。全国好多省市的地方志上,都有冻死人记载——

湖北大冶等地,“冻饿死者甚众”;河南开封一带,“井冰,道路多冻死者”;江西南昌等地,“行人多冻死”;安徽怀宁等地,“冻饿死者甚众”;江苏盱眙等地,“民多冻死,鸟兽入室呼食”;山东临沂等地,“人多冻死”,威海“行人死者无算,屋内亦有冻死者”……